

二战后的美国与“中国大国化”的崩溃 ——从马歇尔调处到亚洲冷战——

1. 战后的双重秩序与亚洲冷战
 - (1) 从中国革命看亚洲冷战
 - (2) “旧的”秩序构想与“新的”时代
2. 从“中国大国化政策”到“遏制”
3. 围绕“中国统一”的问题
4. 马歇尔调处的展开
 - (1) 二战后的中国与苏联
 - (2) 两个方针
 - (3) “限定性干预”与国府的领土接收
 - (4) 国共调停的终结过程
5. 战后美国与“大国中国”的崩溃
 - (1) “中国大国化政策”与中国的内战
 - (2) 内战后的政策变化
 - (3) 干预的类型
 - (4) 对亚洲冷战史研究的批评

1. 战后的双重秩序与亚洲冷战

(1) 从中国革命看亚洲冷战

现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了十多年，然而在亚洲地区冷战的残余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以美国为中心的辐射型同盟体系以及中国与台湾、韩国与北朝鲜的战略布局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随着冷战的结束，虽然这种布局的存在理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些现象的本身依然存在¹。考察亚洲冷战，实际上

¹ 关于以美国为中心而形成的战后东亚地区的特征，请参照白石（[2000]2001：第6章），Ikenberry（2008）。

就是对现代史的回顾，而现代史的开端是与冷战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冷战的局面在亚洲是如何形成的？迄今为止的冷战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详见松村，2004a）。第一种观点认为二战结束时在亚洲已经形成“雅尔塔体系”（美、英、苏三国相互承认彼此的势力圈），这个体系一直维持到1950年6月（第1解释）。根据这一观点，产生于欧洲的冷战以朝鲜战争为契机向亚洲扩大，形成中美对立的局面（Iriye, 1974; Gaddis, 1997; Tucker, 1983; Levine, 1987; 石井, 2002）。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二战的结束，在亚洲也立即出现了冷战（第2解释）。这种观点认为美苏冷战与亚洲各地的对立（内战等）是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对特定区域的研究，进一步厘清这一观点。其最典型的论断是认为从1945年末到46年春在中国东北就已形成了“美国-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府），对苏联-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冷战布局（Westad, 1993; Chen, 2001; Sheng, 1997; 牛, 1992; 杨, 1999; 营, [1992]1997）。

冷战结束后，随着原东方阵营各国档案的开放，亚洲冷战史的研究迅速增加，尤其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增加了。但是，由于这于偏重挖掘新资料，新研究有以下两点偏向。第一，与对西方阵营的形成过程的研究相比，研究的焦点更集中在东方阵营的形成过程上。第二，更加重视美苏以外的行为体（亚洲地区内部的各种势力）。许多新研究把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对亚洲冷战的形成过程进行描述。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在强调中共作用的同时勾画中苏同盟（1950年）的形成过程，其主要观点有：在中苏同盟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比斯大林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Chen, 1992; Goncharov, 1993; Westad, 2003; Heinzig, 2004）；由于中苏同盟的出现，苏联才得以在亚洲对美国采取攻势（或牵制中共的兴起），并同意北朝鲜向南方发动军事进攻（Mastny, 1996; Shen, 2000; 沈, 2003）。

在这个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是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让我们来粗略地整理一下他的观点。文安立认为，“中苏同盟是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反体制势力，甚至可以说是自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后扩张以来对抗西方资本政治优势地位的最大势力”（Westad, 1998: 2）。另外，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在近代具

有受外国控制、以农业社会为主体，容易产生抵抗性意识形态等共同特点，而“东亚地区的核心”就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Westad, 2003: ch.1)。在这样的视点下，中苏同盟被描述为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而且凸显了二战后主导这个同盟形成的中共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结论是，中共经历了从中国东北向全中国发展并建立了中苏东盟的历史，而这个历史过程正是亚洲冷战的形成过程²。

(2) “旧的”秩序构想与“新的”时代

我们暂且离开以前的研究，重新回到国际政治学的视点，来考察“亚洲地区冷战的形成”这一问题。近代以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每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就会形成新的秩序(Ikenberry, 200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是以战胜国为中心构想了一个双重的战后国际秩序。第一是以战胜国为中心的大国之间的秩序；第二是由战胜国实施对战败国的处理。在亚洲，前者是美英中苏的大国之间的秩序，后者是同盟国对日本的占领³。但是，当时中国既没有完成领土的统一，也没有完成政治上的整合（在国内中共拥有独自の军队并在政治上控制着一些地区）（参照，加加美，1994）。于是，在战胜国中，出现了一个大国（美国）对另一个大国（中国）的国家统一进行干预的现象。这一现象起源于二战中美国主导的“中国大国化政策”（Tang, 1963[日文版, 1967; 中文版, 1997]）⁴。但是，由于战后国民党与中共（以下简称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导致“大国中国”未能形成，双重的战后秩序开始瓦解，不久在亚洲便形成了东西两阵营。可见，亚洲的冷战就是这样形成的。

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亚洲冷战史的研究框架，无论是上述“第一

² 有关亚洲冷战史的研究动向，依据松村（2007）讨论过的内容。

³ 在1946年杜鲁门总统的年头国情咨文里凝缩了这个构想的实质。The State of the Union (The President's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Janu. 14, 1946 (Bulletin, 1946, vol. XIV, no. 344: 136, 139). 并参照 Tang (1963: 33-35 [日文版: 41-42; 中文版: 30-32])。

⁴ 本文依据邹谠的提法，使用“中国大国化政策”这一用语(Tang, 1963: 35 [日文版: 42])。虽然中文版的译文是“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中文版: 32)，本文使用从日文版翻译过来的用词。但是因为邹谠并没有明确“中国大国化政策”结束的时期和过程，对这个政策的解释，本文与他的分析存在部分差异。

解释”，还是近年流行的“第二解释”，都不能充分地分析这样的历史性展开。至少可以指出两大问题：

第一，迄今为止的亚洲冷战史研究从来没有触及到二战后美国的“中国大国化政策”的发展过程。“第一解释”把“雅尔塔体系”作为研究的前提，而“雅尔塔体系”本身就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美英苏三大国的体系。“第二解释”把焦点对准美国在中国东北的政策，认为这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解释没有把美国试图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大国中国”的构想包括在内。就是说，两种解释都没有分析战后在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之间的秩序是如何的问题。

第二，中国内战爆发的意义。两种解释都不认为内战爆发使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国政策发生了变化，而是强调美国的政策在内战前后的一贯性。“第一解释”认为，尽管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失利，以美英苏三大国为中心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并没有瓦解而是得以维持（Iriye, 1974: chs.4-5）。“第二解释”的论者则主张美国一贯采取了冷战战略，认为二战一结束，美国就在中国东北采取了阻止苏联和中共势力扩大，确立国府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的遏制政策，正是这个政策成为了国共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依此类推地认为这一政策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发展成了“遏制中国”政策（例如牛, 1992; 营, [1992]1997）。两种解释对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论断，第一种解释认为中国的内战与美苏的冷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第二种解释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相同的是，两种解释都不认为内战爆发导致了美国政策的变化。

通过上述分析的，我们可以认为，迄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回答战后美国是如何展开“中国大国化政策”的，以及在中国的内战中这一政策又是如何崩溃的等一系列问题。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两种解释虽然都看到并讨论了冷战这一“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没有形成一种解释由战胜国与战败国构成的“旧”秩序构想的崩溃是如何创造出冷战“新”时代的这一问题的逻辑框架。“第一解释”否认“雅尔塔体系”的瓦解导致亚洲冷战的诞生，认为产生于欧洲的冷战扩大到亚洲，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崩溃（Iriye, 1974）。“第二解释”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

后，“旧”的秩序构想就已经不存在了。“第二解释”的所有研究都把冷战，特别是东方阵营的形成作为前题。最有象征性的事例是，不把战败国日本作为“东亚的中心”，而认为“东亚的中心”战后伊始即是中共的战略据点东北地区（Westad, 2003）。

本文认为，“新”时代是在“旧”秩序构想的崩溃中产生的⁵。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在战后亚洲地区以战胜国为中心的大国间秩序是如何构想和崩溃的，并且以及冷战是如何随后形成的等问题。具体的说，就是考察战后美国是如何干预“大国中国”的形成的，其构想又是如何瓦解的。可以说 1945 年 12 月到 47 年 1 月，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在国民党与中共之间所进行的调停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而本文所要考察的重点就在这里⁶。

以下，本文提出三个问题（假说），依次进行讨论。第一，美国的战后亚洲地区秩序构想的历史性展开。二战中产生的“中国大国化政策”在战后随着国共内战的开始而崩溃，“遏制”政策则在此崩溃过程中形成。马歇尔调停是“中国大国化政策”走向崩溃过程的最终阶段，其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遏制”政策走向系统化。

第二，美国是如何试图使“大国中国”形成的？在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上美国秉持领土统一与政治整合两大方针，但是这两者互相冲突，不能很好地并存，本文将对这一本质性问题进行考察。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这个问题丧失了其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可以概观整个四十年代美国对亚洲和中国的政策。本文以此为前提再对第三个问题即马歇尔调处进行个别考察。本文的理解是：为了使“大国中国”形成，在马歇尔调处开始时同时存在着领土统一和政治整合两大方针。但是随着当地形势的急剧变化，两个方针相互冲突，不能并存下去。不久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接连丧失了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大国化政策”最终瓦解。通过追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最后证明：美国的“中国大国化政策”因为在很大程

⁵ 一般都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崩溃的过程与冷战形成过程重合起来讨论（参照 Gaddis, 2005: ch.1; 石井, 2002: 第 4 章等）。但是，在战后亚洲的国际政治史中，这一点并不明了。

⁶ 关于马歇尔调处的研究，虽然收集到 Bland (1998) 里的论文具有世界水平，但是其研究的大多是建立在“第二解释”上。关于马歇尔调处的先行研究，参照松村 (2005 b)。

度上依赖于中国人自身的政策选择，所以随着国共双方选择了军事冲突，这个构想彻底崩溃。

本文不能详细列举历史事实，但是为了提供一个大的框架，将根据需要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利用美国政府的档案和制定政策者的日记，回忆录、马歇尔文件、国府和中共的档案，公开发行的资料、已公布的前苏联档案等。

2. 从“中国大国化政策”到“遏制”⁷

二战中，美国是如何规则战后亚洲地区秩序的呢？美国在 1941 年 12 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待中国发挥两个作用。第一是在对日作战中在军事战略上做出贡献。第二是让中国成为政治、军事大国，作为战后亚洲的稳定势力发挥作用。可以说，把中国作为四大国成员之一的“中国大国化政策”这个时候就形成了。美国参战后，在盟国的国际会议上确立了这样的路线（以上 Tang, 1963: ch.2[日文, 中文版: 第 2 章]; Messer, 1989）。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42 年 5 月 29 日晚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总统在华盛顿白宫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iacheslav M. Molotov）的会谈中，就提到了美英苏中四大国“作为世界警察采取共同行动”的构想。（FR 1942, III: 568-569）。可以说，这是战胜国（美英苏中）的大国间秩序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处理相吻合的双重秩序构想。

但是，到 1943 年底，对“大国中国”所期待的作用发生了部分变化。美国本来一直考虑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发动对日本的轰炸和攻击，但从 43 年 9 月前后，又开始计划以太平洋美军为中心直接对日本发起攻击。11 月底，开罗会谈中，蒋介石对从中国本土轰炸和攻击日军持消极态度，英国对在缅甸作战也没有表示出积极姿态。此后，美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FDR 把对日战略的重心由中国本土转向太平洋美军，重要的军事战略和战后构想也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决定了（以上，福田，1979: 122-126, 188-208）。45 年 2 月，美英苏在没

⁷ 这一节的内容是松村（2003）的大幅修正和简略化。

有蒋介石参加的雅尔塔会谈中，做出了苏联对日参战的决定，并同时做出了关系到中国权益的决定，其内容是保存外蒙古的现状，保障苏联在大连拥有“优越权利”、租用旅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经营联合”（CWP, vol.1: 113-114; 大事长编，卷6上册：47-48）。

这样，中国作为对日战略基地的作用大大减退了。但是，并没有改变希望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稳定势力的愿望。雅尔塔会谈前，美国国务院提出：“我们提议，通过我们的主导和支援，使中国能够成为远东地区主要的稳定势力，使他们能够发展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政府”（FR 1945, Malta and Yalta: 353.关于这一点，参照菅，[1992]1997: 64）。结果，在雅尔塔会谈上美英苏都“估计中国将会保障战后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秩序”（Zhao, 1997: 85-86）。

虽然“中国大国化政策”其内容发生了部分变化，但在战后依然被继承下来。也可以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强有力的代替方案。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对战败国日本，实施解除武装、非军事化、发展民主政府、经济非军事化等惩罚性的占领政策（SWNCC150/4, Bulletin 1945, vol.XIII, no.326: 423-427; Schaller, 1985: chs.1-2[日文版：第1-2章]）。

45年11月底，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突然辞去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他指责说，虽然他一直要求对国府实施全方位支持，但由于国务院的政策和一部分外交官的原因使这个目标无法实现（Cohen, 2000: 143-151; 资，1987: 62; Bulletin, 1945, vol.XIII, no.337: 930-931）。美国政府紧急决定把刚刚退任的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立即派往中国。12月15日，在马歇尔访问中国之前，杜鲁门（Harry S. Truman）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表示，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对于同盟国与世界和平来说是最重要的，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和平需要一个统一的民主中国（Bulletin, 1945, vol.XIII, no.318: 945-946）。

建立“大国中国”是马歇尔调处的目标，但是，受国共内战扩大的影响，47年1月马歇尔调处结束。以后，美国被迫对秩序进行重新构想，把战略重点从中国大陆转向太平洋岛屿地区特别是日本，并同

时开始摸索抑制共产势力扩张的“遏制”政策（Gaddis, 1987: 77-78, 80）。

美国的政策发生明显变化是在 1948 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松村, 2003: 9-14）。首先是对华政策。国务卿马歇尔采取的立场是：鉴于中国形势非常不稳定，美国应控制对国共内战的介入以确保行动自由（FR 1948, VII: 416,512-513）。另一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和一部分共和党议员呼吁为抑制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力”的扩张，应积极地对国府进行经济、军事支援（JCS to SWNCC, June.9, 1947, FR 1947, VII: 838-844; Blum, 1982: ch.3, 5, 13）。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以美国国务院的路线为基调的，48 年 6 月制定的《军事援华法案》的内容体现了回避大规模介入内战的宗旨（菅, [1992]1997: 126; Cohen, 2000: 157-160, 175）。

其次是从 47 年下半年开始的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换。主导对日占领政策转换的是凯南（George F. Kennan）。他在国务院政策规划部讨论了对日讲和问题，后于 48 年 3 月访问日本与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会谈，并在回国后的 3 月 25 日提出了总结报告书。他把日本的经济复兴作为“第一目标”，同时还在报告书中写进了讲和后的各种问题、“缓和肃清基准”的问题等。这份报告书对占领政策的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被放在了“遏制”苏联的要塞的位置上（以上、Schaller, 1985: chs.5-7[日文版：第 5-7 章]；五十岚, 1995: 第 1 章；FR 1948, VI: 691-719）。

最后是在亚洲地区发展“经济相互依存”的构想。这一构想以抑制苏联影响力的扩大为目的，把东南亚定位为日本工业制品的输出地和“原料供给地”。这一构想被写进了 49 年 3 月综合性讨论东南亚政策的文件 PPS51 中。在同年年底确定美国政府亚洲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文件 48/2 中，这个构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反映（菅, [1992]1997: 第 4 章；Schaller, 1985: 83, ch.8[日文版：137-138, 第 8 章]；PPS51, NSC48/2, FR 1949, VII: 1128-1133, 1215-1220）。

就这样，到 1949 年，美国在亚洲地区已经确立了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划出阻止共产主义扩张防卫线的政策。但是，就如何划出防卫线的问题还存在争论（详见 Blum, 1982）。到 1949 年 2 月，国务

卿艾奇逊 (Dean G. Acheson) 和国务院一直呼吁在政治经济问题上促使中共与苏联对立, 对中国、台湾不是用军事手段, 而是应该努力用外交、经济手段来防止苏联在中国大陆, 共产主义势力在台湾的控制 (NSC34/2, NSC41, NSC37/1, FR 1949, IX: 492-495, 826-833, 270-275)。另一方面, JCS 认为苏联与中共是铁板一块, 提出应该对台湾进行“某种军事支援” (FR 1949, IX: 261-262, 291)。结果, 到 49 年 3 月, 依据前者的路线, 以下政策被确定下来在台湾政策上只采用外交、经济手段; 在中共与苏联的问题, 促成相双的对立作为基本方向的政策被确定下来 (NSC37/5, NSC37/2, NSC41, FR 1949, IX: 290-292, 281-282, 826-834. 参照 Blum, 1982: ch.2; Chang, 1990: ch.1; Cohen, 2000: 157-160, 175)。

在中国大陆, 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 美国的政策也没有马上出现变化。1949 年 12 月底, 美国决定将其反共军事干预的重点放在日本、琉球、菲律宾, 对台湾、澎湖列岛则使用外交、经济手段, 通过政治、经济、心理手段促使中共与苏联的离间。杜鲁门承认了这一政策 (NSC48/2, FR 1949, VII: 1215-1220. 参照 Blum, 1982: ch.10)。第二年 1 月发表了著名的艾奇逊演说。在演说中, 艾奇逊把美国的“不后防卫线”设置在从阿留申到日本、琉球、菲律宾群岛的连线上, 对台湾、朝鲜半岛的干预则是暧昧不清的 (Bulletin, 1950, XXII, no.551: 111-118. 详见 Gaddis, 1987: ch.4)。

1949 年以后, 虽然围绕防卫线的争论还在继续, 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 JCS 提倡的战略得到全面展开 (详见 Blum, 1982: ch.11)。

3. 围绕“中国统一”的问题⁸

那么, 美国是如何干预“大国中国”的形成的呢?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这一问题的起源与性质。因为此时中国是个既未完成领土统一, 又未实现政治整合的国家 (参照, 加加美, 1994), 美国便从这两个方面干预到中国的国家统一。但是, 要使两者并存殊非易事。如果优

⁸ 这一节的内容是松村 (2004b) 的大幅修正和简化。

先领土统一，那么就要在维持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支援现政权的一元型统治。另一方面，如果优先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推动已经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地区的领土统一就很困难。因为由“谁”“如何”来统治这些地区必须等待政治交涉的结果。美国所面临的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围绕“中国统一”的问题。

问题的起源在 1943 年底。是年 11 月底开罗会谈后，美英中发表宣言，确认恢复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Bulletin, 1943, vol.IX, no.232: 393）。另一方面，随着战局的恶化，美国为了防止国府政权的崩溃开始与中共接近。改组现政府，由各种政治势力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构想（主要是国共联合政府）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Tang, 1963: 150-156[日文版: 135-140; 中文版:138-144]; 山极, 1997: 72-74）。虽然在承认蒋领导下的国府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山极, 1997: 67-71），但是后来在领土统一与改组现政府的优先顺序上产生了问题（松村, 2004b: 37-39）。

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对中共的认识大致有三种立场（以下，详细参照 Tang, 1963: ch.6 [日文, 中文版: 第 6 章]; Cohen, 2000: 141-148; 山极, 1997: 20-24, 第 2, 7 章）。第一种立场以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外交官特别是戴维斯（John P. Davies）和谢伟思（John S. Service）为代表。戴维斯认为中共是民主的、稳健的民族主义者，是肩负中国未来的强大政治势力。谢伟思认为中共的革命是“稳健和民主的”。他们虽然暂时也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长期的、排他性的支持（Report by Davies, CWP, vol.2: 565, 573, 574. Report by Service, FR 1944, VI: 565-566; CWP, vol.2: 566,574）。第二种立场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空军第 14 舰队司令官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中国战线美军总司令官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等军人。他们以美国·国府对苏联·中共这一对立构造为前提，呼吁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府进行军事援助（FR 1944, VI: 158-160; Wedemeyer, 1958: ch.XXIII [日文版, 下: 第 23 章]）。第三种立场是从 1944 年 11 月起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的见解。他不认为苏联与中共是铁板一块，认为在美苏协调下全面支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府是最好办法（FR 1944, VI: 667; FR 1945, VII:

338-340; Tang, 1963: 176-195, 288-300 [日文版: 155-168, 236-244; 中文版:160-175, 254-264]。

二战结束前,这个赫尔利路线成为中国政策的基调(Cohen, 2000: 141-146)。争论公开化是在战后处理与国家建设正式开始的战后。美国政府在中国一方面实施避免内战、支持民主政权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推进战后处理(受理日本军队投降事宜和接受领土),也准备实施把国府军队运送到解放区的支援。1945年8月10日,JCS把这样内容的指令下达到当地司令官魏德迈。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也同意了这一方针(FR 1945, VII: 527-528, 559-561)。但是,11月份,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报告,如果推进对国府军队的运送支援,就有可能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指出了JCS命令的自我矛盾(FR 1945, XII: 605. 参照杉田, 1999: 68-69)。事实上,在支援国府的一元性领土统治的同时推动国共和平进行政治交涉在现实上是困难的。

就这样,在围绕“中国统一”的两个方针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调的情况下,赫尔利大使突然辞职了。马歇尔调处就是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两种方针和立场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开始的。其结果,在任何一个方针都没能实现的情况下,马歇尔调处结束了。

随着“大国中国”的成立变得困难,围绕“中国统一”的争论自身也丧失了现实意义。47年以后,国务卿马歇尔开始呼吁控制对国府的军事、经济支援。认为助长内战,导致美苏关系恶化的大规模支援不适当(FR 1947, VII: 805-806, 850-851, 213, 635)。与此相反,帕特森(Robert P. Patterson)陆军长官认为组建包括中共在内的“民主多党政府”的可能性很小。JCS认为苏联与中共是铁板一块,提出应该对国府提供“慎重地加以计划、严格地加以选择和管理的援助”(FR 1947, VII: 800-802, 842-844)。但是,对华政策的制定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务院的路线,魏德迈使华的最终报告中提出的扩大对国府的军需品和技术援助等建议没有被采纳(Wedemeyer, 1958: 396-398, 472 [日文版, 下: 314-319, 437]。关于这一点,参照Cohen, 2000: 157-160, 175)。还有,如上所述,“军事援华法案”也是要避免介入中国内战的法案。这样,围绕“中国统一”的问题随着“大国中国”的瓦解便从现实性政策争论的对象中排除出来。随后,又出现

了新的问题。

1949年8月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已成定局，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的前言里，就国府失败的问题，国务卿艾奇逊首先列举了国府的腐败和脆弱；中共“以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的身份自居”；美国没有全面进行军事介入的余地等原因（CWP, vol.1: v-vi, xiv, x. 参照山极, 1997:29）。但是，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等势力，对《中国白皮书》进行强烈指责，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中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成了众矢之的（Tang, 1963: 509-510, 538-546, 564-569 [日文版：403-404, 426-431, 447-451；中文版：441-442, 466-472, 487-491]）。其中特别是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马歇尔。麦卡锡严厉地谴责说，曾经出任陆军总参谋长、国共调停人、国务卿的马歇尔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才是国府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McCarthy, [1951]1962）。虽然谴责的根据很贫乏，但是加剧了对华政策的批判⁹。

4. 马歇尔调处的展开

(1) 二战后的中国与苏联

美国把“大国中国”定位为亚洲地区的稳定势力，并干预中国国家统一的最后历史就是马歇尔调处。当时中国处在从和平谈判向内战转变的关键时期，不仅如此，因对日参战而进驻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的动向也对国共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面首先对中国形势和中苏关系进行简单的整理。

1945年8月底到10月在重庆举行了国共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虽然就政治民主化（从训政过度到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的平等和合法化等）、避免内战等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是，是否承认中共地区的地方政府、是否认可中共受理日本军队投降的权利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井上, 2001: 41-43; 松村, 2005a: 171-172）。

到45年11月底，舞台从政治交涉转移到东北争夺战。二战结束

⁹ 关于这一点，参照加藤（2001）。

前，苏联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照会同意对国府进行道义上、物质上的援助，并承认国府对东三省拥有主权（史料初编，第3编，2: 652-656; PKOXX, IV-2: 187-189 [no.710], 197 [no.717]）。但是，自9月中旬开始，苏联军队默认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拒绝国府军队在大连登陆。11月上旬，国府军队试图在营口登陆，但是当地已经有中共军队进驻，所以国府的接收没有取得进展。同月中旬，国府决定应该向苏联暗示苏方的责任，把国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从长春撤退到山海关。随后，苏联的态度立即发生了急剧变化，让中共军队从东北各城市撤出（以上、石井，1990: 27-43; 杨，1997: 531-553; 松村，2005a: 172-174）。

此后，到46年2月底，国共的中心舞台再次回到政治交涉上来。1月，召开了有国共、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从训政向宪政过渡、整编和统编军队（整军）等的决议（史料初编，第7编，2: 229-243.关于这一点，参照横山，1997: 247-249）。

同一时期，围绕东北的战后处理，苏联与国府之间的外交交涉到了最后关头。苏联主张“满洲”是自己的“势力范围（зона）”，作为“战利品”要求设置中苏合办公司来经营遗留在当地的日本资产（为关东军服务的事业）¹⁰。另一方面，国府向苏联政府传达了不承认“战利品”、中苏经济合作在苏联军队完全撤退后再行商议的意见¹¹。苏联的“战利品”要求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强烈反弹。结果，到2月底，苏联与国府的交涉陷入僵局（山本，2005: 252-253）。3月上旬，苏联突然开始从东北撤军，至5月3日所有苏联军队撤出（PKOXX, V-1: 107-108 [no.61]）。

从3月中旬起，政治、军事形势开始恶化。这一形势至少可以从

¹⁰ 例如，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тов.И.В. Сталина с Цзян Цзинго, лич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Чан Кайши, 30 декабря 1945 г., в 21 час;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тов Сталина с Цзян Цзинго, лич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Чан Кайши, 3 января 1946 г., в 23 час（Ледовский, 1999: 24-25, 27, 29）。

¹¹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тов.И.В. Сталина с Цзян Цзинго, лич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Чан Кайши, 30 декабря 1945 г., в 21 час（Ibid: 25）；蒋中正发给张嘉璈的电报，46年1月21日，《蒋文物》，革命文献，戡乱2020.4，戡乱时期4450.01，1，蒋中正革命文献——接收东北与对苏联交涉（上），162；王世杰日记，46年2月7, 20日（王日记: 205, 208）。

以下两点看出。首先，国民党在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二中全会）上修改了政协决议的部分内容，中共谴责这是一党独裁（横山，1997：247-249；史料初编，第7编，2：260-261；周谈判：146-152；CWP, vol.1: 144）。其次，苏联要求中共军队向苏军撤退后地区进军，中共确定了与“友方”（苏联方面）接洽驻兵，占住“整个中东路”的方针（彭真年谱：386, 389-390, 390-391）。自此，国共围绕东北的争夺战激化了。到4月下旬，中共接连控制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暂时处于优势地位。但是，5月下旬国府进军长春，形势发生逆转。这个时候，蒋介石认为，“盖俄国既已承诚退出，则尔后关于东北‘共军’问题或较易处置也”。另一方面，中共也把战略基地从大城市转移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大事长编，卷6上册：150；中共文件，16册：185。参照杨，1997：569）。从此以后，国共军事冲突从东北向华北、全国扩大。

(2) 两个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调处采用了什么样的方针来应对事态的变化呢？首先来看看围绕“中国统一”问题的两个方针是如何并存的。

1945年11月底，赫尔利大使辞职后不到半个月，美国政府就下达了马歇尔调处的任务¹²。任务的下达经过了两个阶段。首先，国务院与陆军部拟订了草案。11月28日，远东局长范宣德（John C. Vincent）拟订了国务院案，强调通过和平交涉促成各政治势力参加的民主政府。虽然他把着力点放在联合政府构想上，但同时也认可了“为恢复在满洲的行政统治而将中国国民政府军队运送到满洲各港口的运输支援”（FR 1945, VII: 745-747）。陆军部对这个国务院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评。11月30日，马歇尔也拟订了一个草案，主张美国对国府控制“满洲”的支援应当优先于国共谈判。他担心“俄罗斯会更加明确那样的控制”（Marshall to Leahy, Nov.30, 1945, FR 1945, VII: 747-748）。

两者为调整意见举行了两次会议（12月9日和11日）。这就是

¹² 关于任务决定过程，根据松村（2005b）详细讨论过的内容。

第二阶段。从一开始，两者就原则上同意了建立联合政府和在东北地区对国府军提供输送支援。引起争论的是对华北的方针。因为国务院案把推动政治谈判的放在比向华北地区运送国府军队更优先的位置，陆军部对此进行了批评(FR 1945, VII: 749-751)。受到批评的国务院最终作出了部分让步。在第一次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便做出让步，表示虽然应该在政治交涉的结果出来后再向华北运送国府军队，但是先应做好追加运送的准备工作(Memorandum by Byrnes, Dec.9, MM: box.1)。不过，在第二次会议中，贝尔纳斯作了这样的陈述：如果因为国府的态度造成马歇尔调处失败，那么就不向华北地区追加运送国府军队，美国的运送支援只限于“把日本人送还日本本国”。会议最终就这个见解达成了一致(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arshall, Dec.11, MM: box.1)。

就这样，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实现领土统一，在其他的“中国本土”(包含华北)地区优先停战并成立联合政府的方针确定下来了。不过，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制订在这两个方针发生冲突时的对策，甚至没有设想到这种冲突事态的出现。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政治统一的具体计划则交给中国人自己决定(Statement by Truman, Dec.15, 1945, Bulletin, 1945, vol.XIII, no.338: 945-946)。

45年12月下旬，马歇尔访问中国，开始调停活动。第二年1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是最初的调停成果¹³。这个协定由两个文件构成。第一是“停战令”，规定国共两军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不过，这个文件附带有规定“停战令”不涉及的范围——停战的“例外”——的附属文件。第二是关于“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军调部)”的文件，决定在北平设置一个实施和监视停战的组织(FR 1946, IX: 125-126, 127-128; 史料初编、第7编, 3: 68-69)。

对于马歇尔调处代表团来说，这次停战调停至少有两个意义。首先是成立了调停组织。由马歇尔与国共双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军三委)是该组织的最高机构，下设军调部，军调部再

¹³ 停战协定的成立过程，根据松村(2005a)详细讨论过的内容。

向各冲突地区派遣停战执行小组（field team、以下简称小组）。每一个组织都由美、国、共三方的成员构成。其次，“停战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方针。停战令的范围限定在中国本土，为了确保国府的进军，东北地区成了停战令涉及不到的“例外”地区。

但是，停战调停没有准备好围绕“中国统一”的两种可能性——国府进军与停战——发生冲突时的对策。是无条件地承认国府军队在东北地区的进军，还是对此附加某种条件，不认可国府军队向中共地区进军？对这个问题又被搁置起来了。在停战谈判中，提出这个问题的只有周恩来。他要求限制国府军的数目和进军路线（军三委会议，1月8日，MM: box.19; 周谈判: 43），主张中共也有接收权（马歇尔和周恩来会谈，1月9日，周谈判: 48）。马歇尔对此并未做出明确回答，每次都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MM: box.19; 周谈判: 48）。中共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最终就“停战协定”达成一致意见。然而协定签订后，中共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松村，2005a: 181-182）。

产生了“权利真空”的地区由“谁”“如何”统治？只要能够继续把关于“中国统一”的问题搁置起来，美国就可以使两个方针并存。

(3) “限定性干预”与国府的领土接收

那么，这两个方针是如何实行的？根据当初的决定，这两个方针的实施期间是46年1月到3月。下面就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这两个方针的实行情况。

首先，看一下关于中国联合政府构想的展开¹⁴。马歇尔为了实行这个构想，采取了三个“限定性干预”对策¹⁵。第一，限定干预的领域。不介入关于改组政府的政治交涉，只干预作为政治交涉出发点的停战调停¹⁶。不过，在有中国方面的请求的情况下，也可以干预政治交涉。例如，1月下旬，马歇尔接受蒋介石的请求，制定了“临时政

¹⁴ 内战前夜中国联合政府构想的展开，根据松村（2006）详细讨论过的内容。

¹⁵ 这与邹谠讨论的“有限援助”不同。他所说的有限性指的是马歇尔对国府的内战不进行无条件支持的意思，并不是在议论如何干预联合政府构想（Tang, 1963: 347, ch.9 [日文版: 279, 第9章; 中文版: 303, 第9章]）。

¹⁶ 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自己避免成为“有关树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论争的调解人”。Marshall to Truman, Janu.24, 1946 (FR 1946, IX: 143)。

府组织法”（FR 1946, IX: 139-141; 大事长编, 卷 6 上册: 24-25）。但是, 因为蒋介石对组织法的内容不满（大事长编, 卷 6 上册: 24），这个组织法在政协决议中没有得到反映。可以说这仅仅是一个非正式提案。2 月份, 虽然整军交涉是在马歇尔与国共代表的三者之间举行, 但这是为了使 1 月底在政协决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整军原则的具体化而进行的交涉, 并没有很明显地干预关于政府改组的交涉（松村, 2006: 4）。

第二是限定地理范围。虽然马歇尔调处代表团的心血大半都倾注在停战调停上, 但是“停战令”所涉及的范围被限定于“中国本土”。1 月中旬以后, 军调部相继向主要军事冲突地区（绥远、热河、山东、山西、河北、广东各省及汉口等）派遣了小组, 但是东北地区被排除在派遣小组的对象之外（军调部的文件, 军三委和军调部会谈, 2 月 28 日, FR 1946, IX: 389, 453-462; 军调情况: 54-171）。军事三人委员会的成员从 2 月底到 3 月初视察了各地的小组, 确认了除一部分地区存在小规模战斗外, 在“中国本土”基本上实现了停战（松村, 2006: 5）。

第三是限定调停期限。马歇尔并不想把调处持续到联合政府成立时终止, 而是希望在成立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熟时就结束调停活动。到 2 月下旬, 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分别成立, 马歇尔认为成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于是开始考虑结束调停工作。按照他的计划, 准备在 8-9 月份结束调停工作（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Chou, Feb.18, MM, Micro: reel.16; Marshall to Robertson, Feb.21, MP: box.123, folder.35），并推举魏德迈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继任人选（Shepley to Marshall, Feb.28, MP: box.124, folder, 32）。

就这样, 马歇尔调处代表团为了实现联合政府构想, 展开了立足于停战调停的“限定性干预”活动。

其次, 是在东北地区所采取的方针。直到 3 月份, 美国按照当初的方针, 全面支持国府接收领土。关于这一点至少从以下两点可以得到确认。首先是美国政府针对苏联在东北地区要求“战利品”一事所采取的态度。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个要求熟视无睹, 2 月上旬以后, 从尊重国府主权、坚持“门户开放”原则的立场出发, 正式向苏联政

府提出了抗议 (FR 1946, X: 1104-1105, 1112-1113.俄文是 PKOXX, V-1: 58-60 [no.21], 77-80 [no.34])。其次是向东北地区运送国府军队的运送支援。1月中旬, 美国政府决定依据武器租借法案确保到 46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对国府的各种军事援助 (Royall and Forrestal to Truman, Junu.14, Acheson to Truman, Janu.19, FR 1946, X: 724-725, 725-728)。2 月份, 魏德迈报告中指出到 9 月 1 日为止完成向东北输送 7 个军的国府军队的计划 (Patterson to Byrnes, Feb.18, FR 1946, X: 729)。

这个时候, 那就是, 支援国府对领土的接收一个原则是明确的, 对于被运送到“满洲”各港口的国府军队登陆后如何进军, 应不应该接收这个地区的领土的问题, 美国并没有主见。因为把“中国统一”的问题搁置起来, 两个方针总算得以并存。

(4) 国共调停的终结过程

3 月以后, 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 遇到了原先一直被搁置的问题。最初被迫改变搁置态度是在对东北地区所采取的方针上。这一改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3 月到 4 月下旬, 在这个阶段马歇尔对当初的方针作了部分修改。

当时, 苏联军队撤退后, 国共在东北地区的争夺战立刻尖锐起来。由于国府在领土接收上行动迟缓、中共已经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足以“无视”停战协定的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美国感到不安 (Meeting of Gillem with the Generalissimo, Mar.21, MM, Micro: reel.16; Gillem to War Department, Mar. 30, ibid: reel.7; Smith to Byrnes, Apr.22, FR 1946, IX: 790)。美国虽然没有抓到中共和苏联关系的决定性证据, 但是对中共军队在东北北部势如破竹的进军态势表示了担心 (Kennan to Byrnes, Junu.10, FR 1946, IX: 118-119; Smyth to Byrnes, Mar.11, Apr.10, US-China: reel.3)。鉴于这样的事态, 从 3 月中旬起马歇尔出面对东北地区的停战进行调停。其结果, 是月 27 日, 军事三人委员会最终决定向东北派遣小组。不过, 小组的任务只限于军事问题, 关于对中共地区的政策等政治问题则被搁置起来。这样, 国府的领土接收原则在事实上得到了维持 (达成一致的协定原文

见 FR 1946, IX: 603)。

美国对东北的方针除国府接收这一原则外，又加上了实施停战这一任务。但是，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的对策被拖延下来。4月下旬以后，便面临两者不能并存，在现实中发生冲突的局面。这就是第二阶段。马歇尔对中共在东北北部地区处于军事优势地位，国府军队难以“重新统治满洲”的形势感到困惑。而且，他还担心军事冲突不断“南下并扩大到中国本土”的局面出现 (Marshall to Truman, May 6, FR 1946, IX: 815-818)。即使是5月下旬以后国府军队在东北地区使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驻华大使馆对形势的认识也依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而最终作出了中共军队抵抗顽强，国府军队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判断 (Smyth to Byrnes, June.4, US-China, reel.3)。

现实问题是，在维持停战状态的同时，继续国府的进军是极为困难的。于是，马歇尔在此时对一直搁置的问题第一次作出了回答。他提议把国府军集结在“满洲南部”，把中共军队部署在“从哈尔滨西部到满洲里的地区” (Memorandum by Marshall to Chiang Kai-shek, May.10, FR 1946, IX: 824-828)。以后，随着内战的扩大，美国政府对国府在东北地区的进军不再进行积极支援。从结果来看，放弃和结束领土统一的方针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而剩下的就只有联合政府构想了。

6月下旬以后，在停战接连不断失败，国共内战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美国开展了什么样的调停？首先整理一下马歇尔与新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 Stuart) 对形势的认识。司徒雷登预测，“最晚在全面内战爆发后6个月内”，“国府的攻势就将会受到阻碍”，而且控制“沿海地区、人口密集地、交通要道”的国府势力与“被赶到内陆地区”的中共将形成“对峙” (Stuart to Byrnes, Sep.27, FR 1946, X: 235-236)。马歇尔担心在华北与“满洲”的内战的扩大会给中共提供“进行破坏活动的好时机”，引起苏联对中国的干涉 (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Chiang Kai-shek, Aug.16, FR 1946, X: 52; Marshall to Truman, Aug.17, *ibid*: 54)。那么，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他们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目标呢？其实，他们只是坚持实现国共停战、

成立联合政府这一既往目标，除此之外并没有准备其他的选项¹⁷。

虽然目标得以维持，但是为了实现目标的调停方法却相继失败。从事停战调停的既存调停组织在 6 月下旬以后陷入了功能不全的状态。军三委的招集变得困难，军调部的停战活动也陷入僵局（Robertson to Marshall, July.13, FR 1946, IX: 1354-1355）。于是，马歇尔为恢复停战状态作了两个准备。第一是构建即使在内战状态下也能调停的框架。随着军事冲突的扩大，对中共地区的政策等原先被搁置的政治问题成为焦点。为此，为了处理政治问题，马歇尔考虑新设一个由美、国、共三方构成的“高级或有名的文职人员代表参加的小组”（Marshall to Truman, June.30, FR 1946, IX: 1271）。第二，马歇尔试图得到精通政治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帮助。作为新的美国驻华大使的候选人，他推荐了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而不是军人魏德迈，就反映了他的想法（Marshall to Acheson, July.5, FR 1946, IX: 1298-1299）。

从 8 月起，马歇尔想把这两种尝试结合在一起，开始向国共双方提议新设“非正式五人委员会(以下简称非正式委员会)”(FR 1946, IX: 1439, 1143-1147, 1453)¹⁸。这是为了给司徒雷登与国共双方的代表提供协商政治问题的机会而设立的组织。但是中共坚决反对这个组织的召集。周恩来追问马歇尔：要想在内战状态下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某种协议极其困难”，召集非正式委员会应以确保停战为条件（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Chou Robertson, and Yeh, Aug.15, FR 1946, X: 29-30 [因为中文的会议记录是摘要（周谈判: 610-611），本文参考了英文记录]；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Stuart, and Chou, Sep.5, FR 1946, X: 132-140）。本来是以恢复停战为目的的尝试，却被以停战状态不成熟为理由遭到拒绝。

对中共的说服工作进展困难，10 月上旬，国府军攻占了中共的战略据点张家口。对这一象征内战激化的事态，马歇尔不仅不能控制

¹⁷ 例如，美国政府的正式见解在 8 月 13 日范宣德与中国驻美大使顾维均的会谈中得到了表明（FR 1946, X: 24）。

¹⁸ 美国政府的档案记录中出现的该委员会的名称有“Dr.Stuart's small group”，“small committee”，“informal committee”，“5 man committee”等多种，并没有确定正式的固有名称。本文为了方便起见把这些统称为“非正式委员会”。

国府军的进军，甚至连调停的手段都确保不了(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Chou, Oct.9, 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Yu, Oct.10, FR 1946, X: 340-341, 349)。受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不久他放弃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调停，转为寻求中国国内势力充当国共调停

(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Liang, Oct.17, FR 1946, X: 385; 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Chou, Oct.26, *ibid*: 433; Marshall to Truman, Oct. 26, *ibid*: 435, 437)。可以说，至此美国的调停实际上结束了。

最初，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发挥了调停人的作用。但是，11月15日，国民党主持召开制宪会议——国民大会时，围绕是否应该参加这个大会，第三方面发生内部分裂，“其[第三方面的]平衡两大政党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Marshall to Truman, Nov.16, FR 1946, X: 548. 详见 Jeans, 1998)。此后，马歇尔没有再亲自主导过调停，而是期待从中国国内的各政党、无党派人士中孕育出新的势力——意义和对象都是暧昧不清的“自由主义势力”，由这种势力来促成联合政府的成立 (FR 1946, X: 551-552, 662-663, 669-670)。可是，马歇尔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培育这种新势力。不仅如此，他还判断，“国民党里很多人，尤其是反动派大概都不得不认为他[马歇尔]在中国的作用是必要的，因为只要让他继续活动，政府反动派就能继续进行非民主的活动和军事作战”(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Butterworth, Dec.1, MM, Micro: reel.4)。

12月以后，美国正式开始考虑结束马歇尔调停。是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总结了马歇尔一年的活动(Bulletin, 1946, vol.XV, no.391: 1179-1183)。28日，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称，既然国民大会已经通过了宪法，以后“中国人自己”应该“实施我已经尽力给他们提出的建议”(FR 1946, X: 664-665)。第二年的1月8日，马歇尔结束调停，踏上了返回美国的路途。1月下旬，杜鲁门决定美国退出军三委、军调部的工作，调停组织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解体了(Carter to Underwood, Janu.27, 1947, FR 1946, X: 709-710)。

就这样，内战的扩大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和为达成目

标所采取的方法背道而驰¹⁹。方法的丧失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它的目标，不久它便放弃了这个目标。1947年以后，国共联合政府构想烟消雾散，一个不以“大国中国”的存在为前提的亚洲地区秩序构想出现了。

5. 战后美国与“大国中国”的崩溃

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二战结束一年半之后便迎来了它的转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构想与中国本地形势的距离越来越大，从而不得不大规模大幅改变其对华政策。下面从四个论点入手重新考察本文的内容。

(1) “中国大国化政策”与中国的内战

第一是二战后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与美国的“中国大国化政策”瓦解过程的关系。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围绕“中国统一”的问题，美国自始就没有作出过详细决策，而是等待中国方面的解决，直到国共内战扩大为止也没有准备好一个具体的答案。无论是在决定马歇尔调停代表团任务的过程中，还是在1946年1月的停战交涉中，或是在3月的东北停战调停中，这个问题始终都被搁置起来了。

越是尊重当地势力的决定，调停对当地形势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微弱。特别是当国共双方打破停战这一“现状维持”局面，使战斗扩大时，美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当地对立的双方所左右。到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变得激烈的5月初，马歇尔才终于开始讨论对“中国统一”问题的具体答案。这是由于东北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以往的方针难以维持，马歇尔才被迫作出回答。其后，由于国共双方的军事和谈判战略，美国甚至连调停都不能确保了。

“中国大国化政策”本身就包含着瓦解的因素。因为，由于“限定性干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共双方的决定，所以当两者选择

¹⁹ 邹说认为马歇尔调处把“目的”想定为改组现国府，把“手段”想定为行使武力，由于缺乏后者而没能达成“目的”。但是，没有分析为了实现成立联合政府这一目标是如何确保和丧失立足于停战的调停手段的这一问题（Tang, 1963: ch.9 [日文，中文版：第9章]）。

武力解决时，这个构想本身的基础就被毁掉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对华政策由于中国内战这一当地势力的选择而瓦解。

(2) 内战后的政策变化

第二个论点是，在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中国内战意味着什么？本文为了分析内战爆发后的政策变化，考察了政策的目标与方法背道而驰的过程。结果表明，到 47 年 1 月，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目标已然失去了实现的方法。由此，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伴随国共内战的爆发瓦解了。这对以后的对华政策而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首先是美国国内——包括政府、议会、新闻界等——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这一争论不是在还多少留有政策选项的马歇尔调处期，而是在政策选择余地已然十分贫乏的 48 年以后加剧的。而且，这一论争不是围绕政策选项的建设性争论，而是把精力耗费在追究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政治责任上。更重要的是，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Tang, 1963[日文版, 1967;中文版, 1997]; 山极, 1997)。

其次是传统原则的后退。从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也是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逐步后退的过程。19 世纪末以来，为了抑制外国势力在中国扩大军事、政治、经济势力，美国确立了“门户开放”的原则(Tang, 1963[日文版, 1967;中文版, 1997]; Williams, [1959]1972)。但是，到 40 年代后半期，中国大陆中的外国势力，除部分地区外，被排除出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国内的势力实现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至此，以外国势力的存在为前提而确立的“门户开放”原则就在很大程度上从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上退下来了。美国已不能再坚持沿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原则，它在对华政策上遇到了新的难题²⁰。

这个难题就是：“中国政府是什么？”马歇尔调处试图在承认既

²⁰ 邹说主张这个传统原则“以两个中国政权的现实而告终”，但是没有具体探讨这个原则的终结过程(Tang, 1963: 590-591 [日文版: 469; 中文版: 510])。Wang (2002) 虽然指出了中共内战胜利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满洲”终结了，但没有阐明它的终结过程。

存政权的基础上使各派政治势力参与其中，因此就直接面临一个事关“中国统一”的问题，即：在现政权的反对势力出现且崛起的时候，如何对他们进行定位。这时，马歇尔明确否定中共从国府独立出来拥有自己的统治地区（Meeting Between Marshall and Chou En-lai, June.17, 1946, FR 1946, IX: 1066）。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府逃往台湾时，“中国政府是什么”这一难题就越来越沉重地压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者的头上。在以后的近 25 年中，美国一直为这一问题伤脑筋。可以说，“中国统一”的问题是冷战期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个难题的起点。

(3) 干预的类型

第三个论点是二战后美国对亚洲地区干预的类型。如何评价马歇尔调停？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期在亚洲形成的一幅图景是，亚洲的很多地区处在国家建设之中，美国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干预（参照藤原，2002; Westad, 2005）。

那么美国的干预有哪些类型呢？菅英辉把它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的和正式的控制”。这一形式出现在不存在美国的“协力者”或培养“协力者”的企图失败了的地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军事力量强权性地进行介入（如韩国）。另一种是“间接的和非正式的控制”。这种形式出现在培养当地的“协力者”取得成功的地区，美国在重视非军事手段（“经济实力、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的基础上，努力与当地形成一致意见（如日本）（菅，2006: 198-199, 207, 220）。尽管这两种类型的介入方法不同，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其政策特点都无疑是以美国自身为中心的辐射型关系为前提，在当地寻求协力者。

但是，能不能说美国总是以这种形式干预亚洲地区呢？与以辐射型关系为基础的政策不同，美国干预的第三种类型是，试图在大国之间建立势力均衡的政策。

如上所述，直到 1947 年前后，美国认为应该赋予“大国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中心势力地位，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培养反共型协力者的坚定意志。马歇尔调停虽然把“大国中国”的出现作为目标，但是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方法

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势力的“限定性干预”。

四十年代末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成立，中苏同盟形成，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在这一系列变化中，美国把“共产中国”看作是自身安全保障的威胁，形成了“遏制”中国的战略。不过，美国在向“共产中国”施加军事、外交压力，维持自己阵营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大使级会谈等方法努力防止与中国的对立升级（以上参照 Ross, 2001: 8-10.和 Zhang and Jia, 2001: 173-199）。因此，“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中美关系的展开与传统的国家间对立没有太大的不同”（Ross, 2001: 8）。可以说，谋求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势力均衡的政策正是美国以辐射型关系为基础相继建立双边同盟关系的背景之一²¹。

以后，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美国一方面抑制对越南战争的军事介入，重新思考“遏制”中国战略，同时着手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在利用中苏对立的同时，谋求在远东地区形成在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日本之间的势力均衡（Chang, 1990: 9-15; Schaller, 2001: 361-389; 藤原, 2002: 169-171）。

上述“中国大国化政策”、冷战时期的“遏制”中国政策、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改善，各自的政策内容有很大不同，各自所处的地区形势与时代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可以认为这些任何一项政策都是美国试图与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之间达成势力均衡的政策²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看作美国干预亚洲的第三种类型²³。

(4) 对亚洲冷战史研究的批评

第四个论点是如何看待亚洲冷战史。二战后亚洲的国际政治史，

²¹ 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在台湾政策上，在确保具有反共性质的抑制扩张政策的“信赖性”的同时，为了稳定与大陆中国的大国间关系，也采取了“自我抑制”性政策（佐桥，2006）。

²² Chang (1990) 从离间中苏的战略与中苏对立的角度的美国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政策进行了分析。在这里，战后的美国一直与大陆中国保持着大国间关系的推测在起作用。

²³ 此处有关干预的类型，仅凭本文的内容无法进行全面论证，因此只是一个有待今后研究和证实的假说。

无论是作为对象的资料还是历史性事实都十分丰富。根据对问题的关心角度的不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焦点作为研究对象。最重要的是，亚洲各地在战后开展的国家建设和独立运动有着各自的个性。但是，考察二战结束后亚洲地区国际政治的展开，至少有两个中心论点。一个是由战胜国与战败国构成的双重战后秩序是如何构想出来，又是如何瓦解的？如何防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形成稳定秩序的问题，可以说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另一个中心论点是，亚洲地区的冷战是如何形成的？

这两个论点是表里一致的，但如上所述，近年的研究中后一个论点是重点。本文对这两个论点进行了综合地加以考察。在战后秩序构想的瓦解过程中，东西两阵营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以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为素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

为了明确议论的大致范围，现将本文的结论归纳如下。一个是在以战胜国为中心所构想的战后秩序的理想状态——“中国大国化政策”——崩溃的过程中，美国改变它的亚洲政策，不久转换为以防卫线为中心的战略。另一个是在中共通过内战从东北向中国大陆全境扩张势力的过程中，美国的“中国大国化政策”随之瓦解，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同盟形成。以上两大事实是并行发生的。因此，我们能够描绘出一个在“中国大国化政策”瓦解的过程中东西两阵营分别形成的大致历史过程。尽管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的历史，但是至少可以认为，不可以把战后亚洲国际政治史的出发点只能放在中国东北。可以说，从中国东北开始叙述历史，不仅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共的战略和对形势的认识的故事手法，而且也是一种从最初开始就预料到冷战特别是东方阵营形成的决定论，是一种对亚洲冷战史解释的错误重构。

例如，不能把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原成东北政策来考虑。认为1946年春美国采取了在东北地区压制中共，确立国府的军事优势地位的“遏制”政策的立论是就不能成立的，更不能说这样的政策引起了中国的内战。如果按照本文的结论，应该说事态的推移正好相反。美国立足于停战调停，但是无论美国如何控制军事冲突，也无论美国如何抑制国府的领土接收，由于国共选择了武力冲突的决定，美国的“中

国大国化政策”崩溃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系统性地建立和实施“遏制”政策，是在“中国大国化政策”崩溃后不久才终于开始的。

受中国内战爆发的影响，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也不能始终一贯地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内来把握内战爆发前后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中国的政策。

在亚洲地区建立稳定秩序防止再次发生战争这一美国的战后秩序构想被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初的内容，被称为“遏制”的政策从中产生和开始运作，并产生出此后持续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亚洲政策和中国的政策的原型。由于一个叫作“冷战”的新时代的到来，原来的战败国（日本）得以与战胜国（美国）结成同盟关系，回归到国际社会。

〈附记〉

本文系对笔者于 2007 年 10 月 13 日向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提交并于 2008 年 2 月 22 日得到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后米国と“大国中国”の崩溃——マーシャル・ミッションを中心に》的大幅修改和浓缩而成。

〈参考文献〉

本文的引用文中，[]内的说明是著者的注释。

对在本文中有略记的，都在前面留下了□印记。

在末尾打上*记号的资料，由加藤公一（岐阜大学）指教或提供。特留记号以示感谢。

英文

Bland, Larry I. ed., *George C.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irginia: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 1998.

Blum, Robert 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82.

[Bullet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nnual volumes, 1941-195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GPO).

Chang, Gordon H.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California, 1990.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Working Paper No.1, June. 1992,

<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ACFAE7.pdf>

—,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ohen, Warren I.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th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 Press, 2000.
- [CWP] Lyman P. Van Slyke reissues,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2 volum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F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volumes, 1942-1949, Washington, D.C: GPO.
- Gaddis, John L.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7.
- .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The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05.
- Goncharov, Sergei N,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eds.,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einzig, Dieter.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M.E. Sharpe, 2004.
- Ikenberry, G. John.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Chung-in Moo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 Debates, Issues, and New Or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pp.19-37.
- Iriye, Akira.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1974.
- Jeanes, Roger B. “Last Chance for Peace: Zhang Junmai (Carsun Chang) and Third-Party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October 1946,” in Bland, ed.,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1998, pp.293-325.
- Levine, Steven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 Manchuria, 1945-194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Mastny, Vojtech.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cCarthy, Joseph R. *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 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New York: The Devin-Adair Company, [1951] 1962.
- Messer, Robert L. "Roosevelt, Truman, and China: An Overview,"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9, pp.63-77.
- [MM] RG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shall Mission Records, 1944-48, box.1-55,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 [MM, Micro]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The Complete Records of the Mission of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reel.1-50. (Microfilm)
- [MP] George C. Marshall Papers, George C. Marshall Library, Lexington, Virginia.
- Ross, Robert 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S. Ross and Jiang Changbin ed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23.
- Schaller, Michael.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日文版]五味俊树监译,《アジアにおける冷戦の起源——アメリカの対日政策》, 木铎社, 1996年)。
- . "Detente an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Or, "Drinking Your Mao Tai and Having Your Vodka, Too"" in Ros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2001, pp.361-389.
- Shen, Zhihua.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Stalin's Strategic Goals in the Far East," *Journal*

- of Cold War Studies*, vol.2, no.2 (Spring 2000), pp.44-68.
- Sheng, Michael M.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Tang, Tsou [邹谠].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日文版]太田一郎译,《アメリカの失败》, 毎日新闻社, 1967年; [中文版]王宁, 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Tucker, Nancy Bernkopf.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1983.
- [US-China]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Record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45-49*, 893.00/11-2145-893.00/ 6-1146. (Microfilm)
- Wang, Chen-mian. "Marshall's Approaches to the Mediation Effort," in Bland, ed.,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1998, pp.21-43.
- Wang, Xiaodong. "Cold War in Manchuria: Sino-Soviet-U.S. Relations, 1948-1953,"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2,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 Wedemeyer, 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Henry Holt & Company, New York), 1958 ([日文版]妹尾作太男译,《第二次大战に胜者なし》, 上下, 讲谈社, [1997]1999年)。
- Westad, Odd Arne.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Introduction," in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46.
- .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Edition,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59] 1972.
- Zhao, Suisheng. *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Old Chinese World Order to Post-Cold War Regional Multipolarity*, Macmillan Press, 1997.
- Zhang, Baijia and Jia Qingguo, “Steering Wheel, Shock Absorber, and Diplomatic Probe in Confrontation Sino-American Ambassadorial Talks Seen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n Ross and Jiang ed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2001, pp.173-199.
-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urushchev*,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俄文

- [РКОХХ] АМ. Ледовский, Р. А. Мировицкая, В. С. Мясников(Составители),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ХХ веке*. Т. IV-2, V-1, 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г, 2005г.
-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 (Москва, 1999г)

日文

- 五十嵐武士 《战后日美关系の形成——讲和・安保と冷战後の視点に立って》，讲谈社，1995年。
- 石井明 《中ソ关系史の研究（1945-195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 石井修 《国际政治史としての二〇世紀》，有信堂高文社，2002年。

- 井上久士《国共交渉と国民政府》，姫田光义编著《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 1945-1949年》，中央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31-52页。
- 加加美光行《国际政治の変動と中国、アジア——非同盟の視点から》，鴨武彦编《讲座 世纪間の世界政治》第3卷，日本评论社，1994年，第93-149页。
- 加藤公一《中国共产党の対米认识とソ连の対日参战问题、1944-1945年——“丧失した机会”と“独立自主”》，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第751号，2001年7月，第32-51页。
- 杉田米行《ヘゲモニーの逆説——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米国の东アジア政策 1941年-1952年》，世界思想社，1999年。
- 菅英輝《米ソ冷战とアメリカのアジア政策》，ミネルヴァ书房，[1992]1997年。
- 同《アメリカのヘゲモニーとアジアの秩序形成，一九四五～一九六五年》，渡辺昭一编《帝国の终焉とアメリカ——アジア国际秩序の再編》，山川出版社，2006年，第196-225页。
- 佐桥亮《ジョンソン政权と台湾海峡两岸——信頼性と自己抑制》，日本台湾学会编《日本台湾学会报》第8号，2006年5月，第42-66页。
-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央公论新社，[2000]2001年。
- 福田茂夫《第二次大战の米军事战略》，中央公论社，1979年。
- 藤原归一《デモクラシーの帝国——アメリカ・戦争・现代世界》，岩波书店，2002年。
- 松村史纪《米国の战后アジア地域秩序构想と中国——“战后”から“战前”へ》，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早稻田政治公法研究》第74号（2003年12月），第1-24页。
- 《(研究ノート)アジアにおける冷战の形成——二つのイメージとその再検討》，アジア政经学会《アジア研究》第50卷第2号（2004年4月），第126-137页（2004a）。
- 《米国と“中国の统一”（一九四〇年代）——二つの力学をめぐ

- って》，《早稻田政治公法研究》第 75 号（2004 年 4 月），第 35-57 页（2004b）。
- 《“停战协定”の成立过程——米国、中国国民政府、中共の“例外”规定をめぐる论争》，《早稻田政治公法研究》第 79 号（2005 年 8 月），第 169-189 页（2005a）。
- 《マーシャル・ミッションの任务决定过程——米国と“中国の统一”》，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国际政治》第 143 号（2005 年 11 月），第 141-154 页（2005b）。
- 《上からの国家建设と大国间秩序の間——中国内战前夜，米国の中国连合政府构想》，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第 60 卷第 8 号（第 702 号），2006 年 8 月，第 1-13 页。
- 《东北アジアにおける冷戦の形成——战后中国をめぐる国际关系》，近现代东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会，《News Letter》第 19 号，2007 年 12 月，第 118-121 页。
- 山极晃《米中关系の历史的展开——一九四一年—一九七九年》，研文出版，1997 年。
- 山本有造《国民政府统治下における东北经济》，江夏由树他编《近代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の新视角》，山川出版社，2005 年，243-273 页。
- 横山宏章《中华民国》，中央公论社，1997 年。

中文（按拼音顺序）

- [彭真年谱]《彭真伝》编写组编《彭真年谱 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 [大事长编] 秦孝仪总编集《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 6 上册，1978 年。*
- [蒋文物]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
- [军调情况] 北京市国家图书馆，新善本，SC277《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1946 年 1 月 13 日—4 月 15 日）。
- 梁敬錚译注《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史料初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编辑委员会编辑、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战时外交，2，（第7编）战后中国，1~3，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
- 王成勉编《马歇尔使华调处日志（1945年11月-1947年1月）》，国史馆，1992年。
- [王日记]「《王世杰日记》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近代史资料』总105号，2003年3月，174-228页
-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 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
- 《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编辑部《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5-22页。
-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
- [中共文件]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16册（1943-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年。
- [周谈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二战后的美国与“中国大国化”的崩溃——从马歇尔调处到亚洲冷战

松村史紀（日本・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早稻田大学现代政治经济研究所助手。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政治、中美关系。发表的学术论文有《马歇尔调处任务的决定过程——美国与“中国统一”》（『国际政治』第 143 号），《亚洲冷战的形成——两种观点及其再探过》（『亚洲研究』第 50 卷第 2 号），《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与大国间秩序——中国内战前夜美国的中国联合政府构想》，（『中国研究月报』第 60 卷 8 号）等。

Postwar America and the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China” : From the Marshall Mission to the Asian Cold War

Matsumura Fuminori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Visiting researcher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Asian Studies, Wased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Doctoral Degree of Politics from Waseda University. Having previously worked as an assistant of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he currently works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The main study field i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Reexamining the Marshall Mission: US Policy towar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3, Nov. 2005, pp.141-154.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Reexamining Two Images,” Jap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2, Apr.2004, pp.126-137. “Between Nation Building from Above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 America’s idea of the Chinese Coalition Government prior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stitute of Chinese Affairs, *Monthly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60, no. 8, Aug. 2006, pp.1-13.



当代中国探索 丛刊（第 2 辑）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一版

责任出版：毛里 和子

出版发行：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 当代中国地区研究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

地 址：162-0042 东京都新宿区早稻田町 27-7 早稻田大学 41-31 号馆 6 楼

电话传真：81-3-5287-5091（5092）

电子信箱：wiccs@china-waseda.jp

网 址：<http://www.china-waseda.jp/>

印 刷：壮光舍

ISSN 1883-0897